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

周发祥、程玉梅、李艳霞、
孙红、张卫晴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杨义 /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

周发祥、程玉梅、李艳霞、孙红、张卫晴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 / 周发祥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6-5182-7

I. 二… II. 周… III. ①翻译—文学史—中国—20世纪
②翻译—文学史—中国—当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150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j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j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43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二章 翻译事业的组织与建设	010
第一节 译者的汇聚	010
第二节 译业的净化	014
第三节 译论的探索	018
第四节 重版与新刊	022
第三章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新高峰(上)	026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翻译文学概况与特点	026
第二节 俄苏文学评介高峰	032
第三节 日本文学的译介	059
第四节 寓言与民间故事的译介	071
第四章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新高峰(下)	092
第一节 概述	092
第二节 半遮面容的文集	102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光辉	116
第四节 揭开欧美当代文坛的面纱	141

第五章 “文革”前的亚非拉文学翻译	154
第一节 概述	154
第二节 “文革”前亚非拉文学翻译特点	156
第三节 亚洲文学翻译简况	160
第四节 非洲文学翻译简况	191
第五节 拉美文学翻译简况	194
第六节 亚非拉文学翻译家	201
第六章 “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	225
第一节 涓涓细流——“文革”期间外国文学 翻译简况	225
第二节 “毒草”暗喻的本体——“文革”期间“内部发行” 的外国文学译作	228
第三节 “世界大好形势”的元素——“文革”期间公开发 行的外国文学译作	260
第四节 暗潮涌动——“文革”期间尚未发表的外国文学 译作	265
后记	274

第一章 绪论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是自清末民初开始在我国逐步繁荣昌盛起来的。而新中国诞生以后直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间，这一事业又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学译笔触及到了五大洲各个角落，世界文苑的奇葩异卉陆续介绍到了我国，极大地丰富着广大读者的精神世界。因此，这个时期堪称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撰写翻译文学史，不可避免地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最主要的应该是分期问题，它与章节的划分密切相关。翻译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原创性的文学艺术有所不同，它属于次生性的再创作，但一种作品一旦译成另一种语言，也就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品格。翻译文学应运而生，随机消长，在博得异国读者欣赏、陶冶其情操与情趣的同时，也接受着这些读者的选择与取舍。它在新时空中成长时所留下的轨迹，便是一段内涵丰富的发展史。我们根据它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可以采用历时视角加以审视。

众所周知，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乃至文化风尚是决定翻译文学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十七年间表现得十分明显。从世界政治格局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冷战思

维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阵营壁垒分明,势若冰炭,而各自拥有的文学艺术,在人们心目中,也就大致有了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进取与颓靡、高雅与低俗之不同。这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影响着我国译业的走向。继之,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其领导人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两国关系由党内分歧迅速转化为公开论战。中苏交恶又给我国译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时,适逢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亚非拉文学自然成了我国译业的重心。

与国际上风云变幻相适应,我国的文化策略、译介方针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切向苏联学习,那些反映苏联人民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1954年8月全国性的文学翻译会议在京召开,茅盾做了主题报告,郭沫若也发表了论翻译的讲话。茅盾肯定“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强调“提高翻译质量”,“是以艺术的创造性的翻译为目标”(《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郭沫若则指出,“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留下了优秀的作品”,“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承受全世界的文学遗产”(《谈文学翻译工作》)。不久,他又撰文指出,除了“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之外,“我们也希望和世界各国学术界有更多的接触……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古典的和近代的学术著作,我们要学习。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学说,我们也都不拒绝。在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讨论,这将是我们的‘百家争鸣’的另一特点”(《“百家争鸣”万岁!》)。在1956年召开的第三届文代会上,会议文件更明确规定:“协同国家出版机关组织翻译力量,在一九六七年以前,将世界古典作家和当代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全部译成汉文出版。有特殊重要性的作家,应翻译出版他的全集。同时,还应大量的出版研究这些作品的由国内外研究家撰写的专门著作。”(1956—1967年《工作纲要》)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强调广泛吸收国外的文学遗产,应该说是五十年代上半叶文学翻译方针比较明显的特征。自五十年代下半叶开始,我国文艺界持续开展整风运动,对待外国文学也更强调二分法,“越是经典越要批判”(周扬语)即是这种态度的写照。因

此,进入六十年代后,尽管俄苏、欧美等国的文学依然有所译介,但亚非拉文学中译的比率明显有所提升。

译业自身也有着潜在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由偏而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接触一国文学往往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开始,而后才较多、大量乃至全面译介。为了更好地理解译入的作家、作品,又往往去接触原作的文化背景、特殊蕴涵和历代所做的评论。文学史、作家论、作品评论和文学理论之类的著作,也伴随作品的译介而译介过来。这样一来也就深化了对作品或文学现象的认识。而且这种发展一般也是历时性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书将建国以来前十七年的文学翻译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而形成了如下三部分: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新高峰》(第三、四章)涵盖建国初到1958年的外国文学翻译状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贫弱、卑贱、灾荒、兵燹走过来的劳苦大众,开始计划并营建自己的新生活。文化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肩负特殊使命的翻译工作,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翻译工作者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如沈志远(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指出的那样:在人民获得解放、革命战争基本结束之后,大规模的和平建设即将展开,“因而人民对于文化教育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迫切了。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文化新高潮。在这一文化新高潮中,翻译工作无疑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翻译通报》发刊词)。时代的召唤,人民的要求,使得翻译工作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们组织队伍,制订计划,积极准备大干一场。与此同时,他们也深切感到译事之艰巨,任重而道远。他们深知翻译文学的新发展,是整个翻译传统强大律动的继续与延伸,自己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应该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编织未来的锦绣前景。这一时期的成绩不容低估,刚刚过了两年,便与解放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做了如下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只短短二年,我们的翻译出版物无论在量的方面或是质的方面,比过去都有显著的进步。先就量的方面来看,在解放前三十年间(即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依据不

甚完全的统计,全国出版的翻译图书,约近七千种。而一九五〇年一年内所出版的翻译图书,已多达二千余种,其中除去解放前译的再版书以外,新译书实计一千一百多种,约为过去三十年内出版数量的七分之一强。再就性质方面来看,在同一期间,译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占全部翻译书的百分之六十七,而译自苏联的仅仅占百分之九点五。到解放以后,前者退到了百分之二〇点五,而后者却升到了百分之七七点五。过去三十年间所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总共不到七百种,而一九五〇年一年内出版(包括再版)的俄文译本已多达一千六百余种。

——沈志远《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

就内容而言,译品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和平、民主、自由、进步、重建家园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一组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如保尔·柯察金、卓娅、卡佳、马特洛索夫)在读者心中矗立起了不朽的丰碑,益智广识、饶有趣味的儿童文学为儿童营造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新中国的译者们一开始就显示出欲揽世界文学珍奇的不凡气度。

接下来四年内的文学翻译,是十七年译业的鼎盛时期。1954年8月19日,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各地的翻译家多达二百余人。茅盾的报告分四个部分:一、介绍世界各国文学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二、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三、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四、加强文学翻译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集体互助精神,培养新的翻译力量。与会代表还讨论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这次会议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58年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众多名家参与,准备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计划性,翻译工作在这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表现在:一、初次中译的外国作家作品数量日渐增加;二、已被译介的外国作家又有未译的作品译为中文;三、一些文坛巨擘的大部头中译选集或全集陆续问世,如《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本,凡十二卷)、《莫里哀喜剧选》(赵少侯译本,凡三卷,含十九部剧本)、《易卜生戏剧集》(潘家洵译本,凡四卷)、《契诃夫小说选集》(汝龙译本,凡二

十七种)。这为全面了解、研究某个作家提供了方便。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工作有所加强,翻译界出版了《文艺理论译丛》、《戏剧理论论文集》、《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等著作。总之,从现代到古典,从作品到理论,从苏联和民主主义国家到欧美诸国,再到亚非拉世界,译介的领域大大扩展了。历史所赋予广大译者的伟业,现在又获得了新的进展。在回顾十年来的工作时,他们曾欣然宣称:“开国以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新社会的优越条件之下,发扬了‘五四’以来外国文学介绍工作的优良传统,开辟了解放以前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不曾达到的新领域。短短的十年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有了健康的发展。”(卞之琳等《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

《“文革”前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第五章)包括六十年代前六年的翻译状况。这是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一个时期。中苏政治上的分歧,渗透进了翻译界。我国译者对苏联文学一改过去那种肯定、赞赏、奉为楷模的态度,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尽管过去译介俄苏的计划仍在执行,并有重要的译著出版,但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译者们也试图寻找反面教材,译过来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时翻译欧美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英国的高尔斯华绥、乔叟、萧伯纳,法国的莫里哀,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欧·亨利等译介较多。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亚非拉文学的译介。以前很多国家的作品没有中译本(期刊译文除外),这时却从无到有,初次接触我国读者,如亚洲的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勒斯坦,非洲的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几内亚、加纳、安哥拉,拉丁美洲的厄瓜多尔、秘鲁、巴拉圭,等等。有些国家的作家作品是做过译介的,这时则有了新的译本,如印度尼西亚、埃及、古巴、智利,等等。亚非拉国家处于反帝反殖的前沿阵地,我国译介的绝大多数是它们战斗性极强的小说和诗歌。

山雨欲来风满楼。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有历史使命感的广大译者依然希望再接再厉积极推动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冯至撰写了题为《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的文章,刊登在当年的《世界文学》杂志上。他说:

建国以来，外国文学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外国的古典名著、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随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迅速发展，翻译介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西方资产阶级颓废的、反动的文学在新中国完全丧失了市场。译文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国家设立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机构，文艺团体也密切关心外国文学的情况和动向，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外国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外国文学工作者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外国文学工作在建国以来十几年的成绩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几十年。

这是将来做好外国文学工作的物质基础，但文题所示的那种昂扬的热情，接着便被动乱时代无情地窒息了。

由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本书关于十七年文学翻译工作的分期，是根据它的总体走向而划分的。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固然很好，但有时两个时期也会互相交叠而边缘不清。1954年8月召开的全国性文学翻译会议属于前一种情况，就翻译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来看，前后两个时期判然有别。而第二个分界线只能说是个大致的划分。一是因为中苏交恶在政治上是个渐进的过程，而在翻译工作上体现出来，不仅滞后而且缓慢。1959年茅盾出席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依然热情称赞“光荣的苏联文学”，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它给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性劳动和英勇斗争以深刻的反映（……它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冷战、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具有伟大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经验的苏联文学，正在向世界艺术创作的新的巅峰前进”（《大会祝词》）。苏联作家在会上也指出，“我们苏联文学和伟大中国的现代文学不单单是善邻，而且是近亲”（柯切托夫发言《主要方向》）。二是因为我国译介亚非拉文学也是个渐进的过程。且不说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在建国之初即有大量译介，其他亚非拉国家的作家作品也时见较早的译例，如土耳其的萨巴哈钦·阿里、希克梅特，南非的阿伯拉罕姆斯，巴西的乔治·亚马多，智利的

聂鲁达。1958年《译文》月刊连续开设“亚非国家文学专号”和“现代拉丁美洲诗集”，无疑是亚非拉文学译介高潮到来的风信标。然而，及至六十年代上半叶，这种译介才形成规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划分时期只有相对的合理性，如果换一种视角便会有不同分期方案。

按照撰写计划，本书还应该涉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翻译情况，《“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第六章)将讨论1966年5月到1976年底十年间的文学翻译情况。在这段萧索的年代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学翻译遭到了严重摧残。那时，《世界文学》被迫停刊，只有内部发行的《摘译》于数年间(1953—1976)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中译。关于这个刊物的编辑方针，编辑组回答读者说：“《摘译》是一本只供有关部门和专业单位参考的内部刊物。(顺便提一下：不是为了批判和研究，只是单纯的阅读，甚至是‘欣赏’，而在人们中间流传，那是不对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艺揭示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为反帝反修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资料……”(1976年第1期)单行译本的情况大体类此，许多书出版是为批判而内部发行。其中，苏联的反华作品比重较大，如电影剧本《德尔苏·乌扎拉》、长篇小说《阿穆尔河的里程》、《苏修短篇小说集》(《摘译》增刊)等。真正作为正面读物的则数量不多，它们大多反映亚非拉人民的斗争生活，如《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集》、《巴勒斯坦战斗诗集》、《柬埔寨通讯集》、《莫桑比克战斗诗集》。有些则反映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如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蟹工船》，伦沙万的《生活的道路》，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青铜的种族》等。这些译著和译文的发表，形成了十年动乱期间的涓涓细流，它们在读者大众的文艺生活中增添着某种色彩，在揭示事实真相、沟通中外信息方面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是共时因素的处理问题。所谓共时因素，与历时因素不同，它是指翻译文学中的平行因素，其间构成了特殊的因果关系。译者与译作便是一对共时因素。按理说，虽然翻译文学是一种再创作，但译者毕竟是再创作的主体，其作用是支配性的。那么，翻译文学史就应该凸显译者的劳作和成就。不过，这种主体并不像原作者那样具有唯一性，而且不同译者的艺术手法也有高下之分，所以本书仍以外国文学作品为主，

只是在相应的段落介绍成就巨大的译者,而一般译者则以注文说明。此外,文学自身还有文类之别,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通讯报道、寓言、民间故事,等等。而我国翻译文学史涉及五大洲众多国家,读者有理由要求给出明确的地理概念,以确定原作之所由来,比较各国文学中译之多寡。有时读者甚至可能希望看到各国的文学中译之久新——而这又涉及历时因素了。本书在引文中或以附录形式提供这种信息,门类纵横交织,丰富翻译史的内容。

再次是“时代精神”问题。众所周知,各个时代的文艺创作无不反映特定的思想内涵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翻译文学取自外国,是否也有这样的时代精神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原作来自不同的国家,而它们在原在国又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但经过选择,那些来源不一、个性突出的作品也就有了相对集中的共同性。这种选择一方面要符合选译者的事先预设的标准,另一方面,在译出之后经过读者接受态度(喜恶、迎拒,等等)的考验而有所改变。建国后十七年来外国文学的阅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性阅读”,其特征是:广大读者对某些重要著作的认识几乎高度一致;集中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而非艺术性),尤其是关于英模人物的描写;关于外国文学作品,较少看到各抒己见的讨论,在外国文学评论界实际上并未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显然,这种阅读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特殊的需求唤来了特殊的产品,读者如何接受决定着翻译作品的命运,因而翻译文学在回应时代呼唤之时,也就酿成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十七年翻译文学的这种精神:

一、密切联系时局的当下性。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当前世界各地激烈而残酷的反帝、反殖、反修斗争,译者们往往很快就把原文译成中文。抗美援朝时的报告文学(如《中朝人民英雄的故事》、《同志们,看见海了!》)即是显例,像短篇小说集《燃烧的月尾岛》、诗集《朝鲜在战斗》等,也同样具有报告文学的性质。越南民族英雄阮文追,1964年10月被美帝国主义杀害,次年便有了描写她与敌人斗争的报道《像她那样生活》的中译本。苏联作品迅速译成中文的例子数量更多,不胜枚举。这类译作就像事情发生在身边一样,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加强了读者与世界

各国人民在心灵上的沟通。

二、提供异国信息的认知性。外国文学产生于国外,其中人物、情节、场景、描述等均不同于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本国作品,译作便成了了解他者的窗口。从大处来说,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凶险四伏的阶级社会,揭竿而起的贫苦大众,无辜者遭受凌辱、蹂躏的残酷现实,等等,均可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描写,从而提高对于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作品也介绍某地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历史变迁等知识,也是人们增益见识的信息来源。至于那些充满幻想、引人入胜的科幻作品(如儒勒·凡尔纳的多种著作),则引导儿童认识并起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三、树立楷模形象的教育性。这一点尤为重要。任何翻译活动都有它的功利性,教育人们弃恶从善是最基本的目标,而鼓励人们向英模人物学习才是当时译作主要的期待。其中优秀的作品也确实在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像塑造保尔·柯察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马特洛索夫的《普通一兵》、塑造英雄群体的《青年近卫军》,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百读不厌。描写斯达汉诺夫式劳动者的作品,也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共鸣,投身于生产建设的读者群纷纷以之为榜样,学习他们的工作方法以及献身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作品在我国思想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译业兴盛、译人众多、译著繁富、译笔精湛的繁荣景象,这是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一种景象。尽管频繁的政治运动影响着翻译工作的正常化,而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又基本上中断了翻译工作,但是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仍然称得上是我国翻译史上的光辉一页。

第二章 翻译事业的组织与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年间,翻译界提出了从分散到组织、从无序到有序的口号,译坛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广大译者受到新形势的鼓舞,满怀豪情壮志,准备在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中大显身手。他们一面重刊旧著,一面奉献新作,精心装点着译林的春天。

第一节 译者的汇聚

在1949年百花争艳的盛夏季节,正值大江南北解放战争摧枯拉朽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欢聚北平,于6月30日至7月28日召开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与会代表中,有不少是专职的文学翻译家,或者兼执译笔的文学家,如李青崖、萧三、潘家洵、曹靖华、董秋斯、王力、金人、罗念生、闻家驷、焦菊隐、李霁野、李健吾、卞之琳、姜椿芳、冯亦代、戈宝权、袁水拍等,总数不下六十人。

这次大会是我国文学艺术界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为了推动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迅速发展,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的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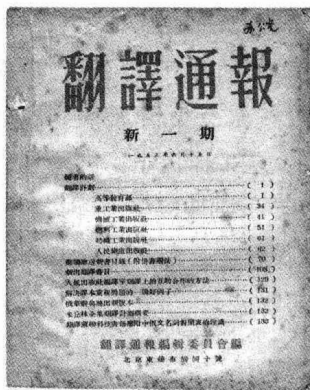
质和特点,号召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会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和舞蹈各界代表先后做了专题发言,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翻译工作的报告,但沟通中外的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调。郭沫若在总报告中为以后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其中有一项便与翻译有关。他说:“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也强调“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②。显而易见,上述“有机的联系”的建立,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进行,主要是依靠翻译这条便捷而有效的途径来实现的。

广大翻译工作者为了积极投身于建设新文艺的洪流,也做了一些组织和建设工作。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前,甚至在上海尚未解放之前,这里的翻译工作者就在交换意见,筹划成立译协。同年11月13日,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推选董秋斯为大会主席,选出执委十九人,并且讨论通过了协会简章。会员共计一百五十三人,从事文学翻译者人数最多,几乎占全体会员的一半。译协成立的宗旨在于:团结翻译工作者,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培植翻译人才,提高翻译水准,参加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其具体任务则是编辑翻译书刊,推进翻译工作,检讨翻译成绩和辅助翻译教育四项。^③上海译协利用《翻译》月刊,积极译介国外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北京的组织工作稍迟些,但因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影响也大些。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出版总署之时,也下设了一个翻译局(不久改称编译局),旨在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经验,同时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作品。翻译局很重视译品的质量,

①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41页。

② 同上,第573页。引文系《总纲》第四条第六款。

③ 参见《翻译》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世界知识社,1949年12月,第64—65页。



△《翻译通报》新一期，
1953年6月15日出版

采取了分组负责、专人校对、集体释疑等措施。一部译著必须经过选书、翻译、自校、互校、校对室校阅、该管处负责人审阅、局长审阅诸多步骤，最后才得以付梓印行。翻译局与在京的各大学、各主要机关以及华北、华东、西北的翻译工作者建立了联系，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讨论亟待解决的翻译问题，并请他们代为组织或翻译稿件。^①

出版总署及其下属的翻译局成立以后，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举措，来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如促成《翻译通报》月刊的诞生，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等等。这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50年1月16日，翻译局召开讨论会，与会者一致倡议创办一个刊物，作为全国翻译工作者进行交流的开端。经过数月酝酿，很快便有了具体方案；同年5月25日，筹委会开会，决定所办刊物以联系、交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翻译水准为宗旨，刊名定为《翻译通报》。编委来自驻京的十五个单位，除出版总署外，还有中宣部、文化部、军委会、科学院、新华社、人民大学、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时代出版社、《人民日报》社等。常务编委有朱葆光、胡仲持、陈冰夷、曹汀和董秋斯五人，召集人是新近调到北京的董秋斯。这个刊物不同于上海的《翻译》月刊，一般不刊载译文，而是译介翻译理论与经验，评介译著和外文书刊，解答翻译问题，披露翻译计划，并报道翻译界动态。^②它的第一卷（共六期）是非卖品，从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1月15日）开始公开发行。在刊行期间，它一直是翻译界的核心刊物。

“五四”翻译座谈会于1951年4月19日在出版总署文化宫召开，与会者一百余人，名家如林，各擅胜场。会议由叶圣陶主持；讨论的重点

① 参见张君悌《出版总署翻译局》，《翻译通报》第一卷第三期，1950年9月1日。
② 参见《本刊筹备经过》，《翻译通报》创刊号，1950年7月1日。